

320.7 071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 季羨林总主编

中外教育交流史

A CHINESE-FOREIGN EXCHANGE HISTORY OF EDUCATION

● 主编 卫道治 副主编 张杰 王奇生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中外教育交流史

主编 卫道治

副主编 张 杰 王奇生

责任编辑:刘清华 聂乐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12.625 字数:339000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55—2518—0/G·2513

定价:21.1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论文中，在学术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中，都提到了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只要稍稍思考一下，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试想，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向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说文化只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产品，即使不是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至少也含有民族歧视的因素，是与历史事实相违的。当人类初成人类时，当由狩猎者变为采集者时，为了生存，人类就会开始交流经验。哪一种动物能吃，好吃；哪种植物能吃，好吃，这样的经验都需要交流。范围一扩大，组成了部落，部落与部落间的交流，就成了逐渐扩大的文化交流的滥觞。这种交流，对人类的生存与繁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决不可缺少的。事实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吗？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交流的范围日益扩大。物质方面固然可以交流，精神方面何独不然？宗教信仰可以交流，已为人类历史所证明。天文、历算、科学、技术等等的交流也屡见不鲜。至于哲学、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的交流，更是司空见惯。这些交流所起的作用，不管是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的，还是隐而不彰，难以感觉到的，都有大量的事实可以列举，用不着更多的例证。

到了今天，人类已经处在 20 世纪的世纪末中；再过不多几年，一个新的世纪就将降临世间。全世界的民族，不管多么僻远，多么落后，无不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文化交流的甜头。苦头当然也

是有的，毕竟是甜头为主。但是，我个人深切感觉到，在全球的芸芸众生中，究竟有几个人意识到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呢？在这一方面，人们大都是浑浑噩噩，“不识不知，顺辛之则”，连文化交流这个概念都完全是陌生的。

同世界历史上一些时代——也可以说是一切时代，因为没有哪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相比，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定，也谈不到友谊和团结。这种情况彰彰在人耳目，用不着再去描述。我在这里谈的是过去和现在，那么将来怎样呢？如果人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去努力加以改变，则鉴古以知今，鉴今以知未来，人类在未来也不会得到安定，得到友谊，得到团结。

可是我偏偏有一个信念：我相信，不管今天人类所处的境遇多么糟糕，也不管人间有多少是非，有朝一日——当然是在遥远渺茫的未来——人类终将共同跻入大同之域。至于用什么形式，那不是个主要的问题。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步，决不能空等天上会掉下馅儿饼来，人们必须努力，张皇人类中的安定与友谊，和平与稳定。这种张皇不是诉之于宗教信仰，而是诉之于理智，这里面包括思辨与行动。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让人们从切身的感受中了解到，人类是互相依存的，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浑然一体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大道多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必拘泥。但是，我总认为，其中有一条阳关大道，这就是撰写文化交流史。从中国来说，就是撰写中外文化交流史。写文化交流史，能够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人类的互相依存，说明人类的相辅相成，说明人类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不必空讲大而空的道理，而读者自然就能油然而生友谊与感情，团结与安定从而出现。难道这还不算是一条阳关大道吗？

根据我这种肤浅的了解，我们这一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的目的就在于此。因此，这一套丛书既有深切的学术意义，又

有实用的现实意义，决非空洞的为学术而学术。

以上所论，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想法。我虽是本丛书的主编，决不想强加于人。每一部的作者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至于材料翔实，立论谨严，实事求是，不尚炫耀，我相信每一位作者都能做到的，就不再啰嗦了。

是为序。

1993. 12. 20

目 录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	季羡林 (1)
第一章 古代中外教育交流	(1)
第一节 华夏向“四夷”的教育辐射	(2)
一、多元的华夏文明	(2)
二、中华文化圈内的教育交流	(5)
第二节 遣隋使与遣唐使	(19)
一、隋唐以前的中日文化教育交流	(19)
二、遣隋使与遣唐使概况	(21)
三、日本对唐朝教育制度的模仿与吸收	(27)
第三节 学问僧与来华留学生	(32)
一、佛教在东亚的传播	(32)
二、学问僧与留学生对中日文化教育交流的贡献	(37)
三、渡日中国人与中日文化教育交流	(51)
四、朱舜水的杰出贡献	(56)
第四节 书院文化远播海外	(61)
一、中国的书院文化	(61)
二、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	(67)
三、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	(70)
第五节 古代中西文化教育交流	(72)

一、汉唐时代中西交通的开辟	(72)
二、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中西文化教育交流	(75)
三、耶稣会士来华与西学东渐	(79)
四、中学西渐与儒家教育流播西方	(85)
第二章 近代中日教育交流	(91)
第一节 模仿与借鉴：清末教育改革中的日本模式	(92)
一、教育交流的涓涓细流	(93)
二、官绅赴日考察学务	(99)
三、日本学制的移植	(107)
第二节 日本教习与清末新教育	(112)
一、日本教习群体概貌	(112)
二、日本教习对清末新教育的贡献	(117)
第三节 从淡化到恶化：民国中日教育关系的演变	(122)
一、淡化与摩擦：1912—1931	(122)
二、恶化与对立：1931—1945	(128)
第四节 半个世纪的留日运动	(136)
一、清末的留日学生	(137)
二、民国前期的留日学生	(143)
三、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	(150)
第三章 近代中美教育交流	(159)
第一节 留美学生与中美教育交流	(159)
一、幼童留美与清末留美教育	(159)
二、庚子赔款与清华学校	(163)
三、民初留美概观	(168)
四、抗战前后的留美学生	(171)
五、留美学生群体概况	(176)
六、留美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180)
第二节 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教会学校	(181)
一、早期教会学校的兴起	(182)

二、教会大学的建立与发展·····	(187)
三、20 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	(193)
四、30 年代教会学校的中国化与世俗化·····	(197)
五、战争的冲击与战后恢复·····	(199)
六、教会学校的存在意义·····	(202)
第三节 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207)
一、胡适留美与实验主义东渐·····	(208)
二、杜威来华的直接影响·····	(210)
三、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哲学简介·····	(216)
四、平民教育思想的推进与演变·····	(219)
第四节 学制演变与美国教育模式·····	(227)
一、新学制的酝酿与制定·····	(227)
二、壬戌学制与美国模式·····	(232)
三、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	(234)
四、美国教育模式的批判·····	(237)
第四章 近代中欧教育交流·····	(242)
第一节 晚清时期欧洲各国对华教育输出·····	(242)
一、清末英法两国传教士在华举办教会教育·····	(242)
二、清末德国在华举办世俗教育·····	(249)
三、欧洲教师在清末官办学校中所起的作用·····	(251)
四、欧洲传教士在编译教科书方面所起的作用·····	(256)
第二节 民国时期欧洲各国对华教育输出·····	(262)
一、英法在华教会教育的发展·····	(262)
二、民国时期德国在华教育活动·····	(268)
第三节 近代中国留欧教育·····	(272)
一、晚清中国人留学欧洲·····	(272)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留欧教育·····	(283)
三、国民政府时期的留欧教育·····	(289)
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294)

五、欧洲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与教育交流·····	(304)
第四节 蔡元培罗素与中欧教育交流·····	(310)
一、蔡元培对欧洲教育制度的借鉴·····	(310)
二、罗素来华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315)
第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教育交流·····	(318)
第一节 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关系·····	(318)
一、全面学习苏联·····	(318)
二、苏联在 50 年代中国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330)
三、新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交流·····	(331)
第二节 “文革”十年对外教育交流·····	(335)
一、“文革”初期 (1966—1970) 的对外教育交流 ·····	(336)
二、“文革”后期 (1971—1976) 的对外教育交流 ·····	(337)
第三节 新时期中外教育交流·····	(339)
一、概述·····	(339)
二、国际教育交流的主要形式·····	(342)
三、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	(385)
编后赞语·····	(392)

第一章 古代中外教育交流

文化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又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人类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这种动态开放，一方面是指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包括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吸纳融合。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只有在与异域文化乃至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才能得到不断的自我更新，从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日臻成熟和繁荣昌盛。否则，无论这种文化曾经发展到多么高的程度，曾经创造过多么辉煌的成果，最终都免不了走向衰落甚至消亡的命运。

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中国一方面以其博大的胸襟吸收着外域文化，从中采撷精华为己所用，一方面又以它进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其周边国家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产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影响，从而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教育则是文化中非常特殊的一个部分。按照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物）、制度文化（心物结合）和精神文化（心）这样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至于教育，把它归入哪一个层面似乎都不太合适。事实上，无论哪一种文化，从纵向看它要一代一代地传承，从横向看它要与另一系统的文化进行交流，这都不能不依赖教育。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传播和继承人类文化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

是文化赖以生存的一种载体。因而，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交流绝不可能孤立进行，而是与文化的各个方面的交流混杂交融在一起的。正因为教育的这种特殊性，在本章中并不仅限于叙述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中外交流，而是力图涉及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华夏向“四夷”的教育辐射

我们习惯以“中华民族”来泛指历来在中国境内生息繁衍的各民族。一般认为，华夏先民因建都于黄河流域，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中”者，居四方之中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历来都有很浓厚的自我中心意识。华夏族为“中”，四方各族则称之为“夷”，古时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这就是我们的华夏祖先为四方各族分别取的名号，称谓虽不同，却同样都是“非我族类”。古代中国人的民族观与今天是很不相同的，他们并没有将今天看来已是中华民族一部分的少数民族与域外各民族区分开来，而是等而观之，统称为“四夷”，这里也就权且从此叫法。

一 多元的华夏文明

中华文明并不是单一源头的文明，其发生是多元的。

原始社会后期，我国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部落，其中活动在黄河、淮河、长江几大流域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大的集团：

炎黄集团。炎帝号神农氏，生于渭水的支流姜水，故为姜姓部落的始祖。其后裔有四支，其中著名的是烈山氏和共工氏。烈山氏之子柱始种谷物和蔬菜，被奉为稷神；共工氏则因其怒触不

周山而闻名于后世，而且其子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为社”。^① 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因兴于渭水流域的姬水，故姓姬。根据各族的起源传说和有关记载，夏、商、周人始祖都与黄帝有关：夏人的始祖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商人的始祖契相传为简狄吞食玄鸟之卵而生，简狄则是黄帝曾孙帝喾的次妃；周人之祖后稷相传为姜嫄踏天帝足印而产，而姜嫄又是帝喾的元妃。因此，黄帝便被视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了。炎黄两部世代通婚，结成部落联盟，称为华夏或诸夏。

东夷集团。其首领先后为太昊和少昊，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和河南东南部。传说黄帝之后颛顼和帝喾都曾向东方发展，与东夷逐渐融合。史载“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② 九黎的首领正是后来与黄帝恶战的蚩尤。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这个集团包括了钻木取火的伏羲氏和补天造人的女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开始出现，各部族之间因为利益冲突而不断进行着战争。最初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在华夏集团内的炎黄两部之间。史籍中描绘了战争的场面：“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师熊、黑、狼、豹、豺、虎为前驱，雕、鹞、鹰、鸢为旗帜。”^③ 战争的结果是炎帝溃败，向东南方转移，渐与东夷和苗蛮融合。随后黄帝又率诸夏“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④ 蚩尤大败，被处死于黎山之丘。从此黄帝势力日盛，并与诸夷结成更大规模的部落联盟。

可见，华夏集团是通过不断的兼并战争，打败其他部落并与之不断融合而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本就是与各部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史学

① 《国语·鲁语上》。

② 《国语·楚语》。

③ 《列子·黄帝篇》。

④ 《史记·五帝本纪》。

家往往把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过巨大作用的一些重要发明归功于某一个人。我们仅从这些“发明家”所属的部族即可看到，中华民族的产生绝非仅赖华夏一族之力。除了“尝百草之实，察酸果之味，教民食五谷”^①的炎帝神农氏、“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②的黄帝以及前面提到的社神后土、稷神柱属华夏族外，其他如凿井的伯益、射日的后羿，为舜掌管刑法的皋陶都属于东夷集团，前述钻木取火的伏羲氏和补天造人的女娲则出自苗蛮集团。

根据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中华民族传统的吉祥物——龙即是中华文化多元发生的一种反映。龙这种文化意象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中华民族甚至把自己的文化称为“龙的文化”，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而事实上，龙只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其形象的构成是：“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③这种形象比较合理的文化学解释是：随着氏族、部落之间的融合，作为氏族标志的各种图腾也产生拼合，各取其外型特点鲜明的部位，拼合成了一种综合性的，虚构的动物——龙。^④龙的形象构成的复杂，正说明中华民族的形成是经历了诸多氏族部落的长期交流与融合，中华文明是一种多元的文明。而今天我们之所以称自己的先祖为华夏族，是因为华夏集团在这种融合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之故。

华夏文明本身即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其产生的多元性大概也正预示着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会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与异域文明进行交流。

① 《淮南子·修务》。

② 谯周：《古史考》。

③ 罗愿：《尔雅翼·释龙》。

④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二 中华文化圈内的教育交流

文化史研究中有“文化圈”之说。所谓“文化圈”，是指“由主要文化特质相同或相近，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的多个文化丛相连接所构成的有机文化体系。”^①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长期以来就是人类文化的中心之一，它在世界文化中的领先地位保持了许多个世纪。由于地理和文化上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东亚逐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或称东亚文化圈），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并称为世界五大文化圈。

由于圈内诸国的文化发展程度有高有低，一个文化圈中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从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向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流播，在文化学中，前者称为“辐射文化”，后者称为“受容文化”。在中华文化圈中，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是“辐射文化”，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则是文化的受容国。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中，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这一内容在整个古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中所占比重也最大，因而本章将在后几节专门叙述。

1. 先秦至汉代中国教育的演变

中国与中华文化圈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交流，大多始于汉代。但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交流，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汉代以前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演变过程。

有人曾将夏商周直至汉代中国教育思想的不同特点分别进行了归纳：夏代因为境内还存在着正向国家转化的氏族部落，它要依靠武力去掠夺战俘充当奴隶和镇压奴隶反抗，所以它的教育以

^①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页。

射、御等军事教育为主要内容,其教育思想以“重戎尚武”为主要特征。商代主要靠尊崇和祭祀尽量多的先祖神来发展子姓部族的势力,巩固商王朝在方国联盟中稳固的核心地位,故其教育思想的特征是“敬神”,教育成了宗教的附庸。西周教育是在井田制、宗法分封制和以尊卑为礼制的思想文化日臻完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建立了奴隶制学校教育完善的体制,其教育思想是文武并重、“六艺”兼备。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大变革的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各派虽然对于教育的看法各不相同,却都主张将教育作用于他们的理想社会,都重视伦理道德教育,自此开始形成中国以礼义为基因的传统教育思想的特色。秦王朝一统天下,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秩序,实行“以法为教”,但同时也较重视礼义教化。到了汉代,最初80年是休养生息,讲究“无为而治”,而至汉武帝时,为与大一统的集权政治相一致,为君主专制提供思想保证,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为教育指导思想,强调的是封建伦理道德,其基本内容是以“六艺”为准,以儒学经典为教材。^①

可以看出,上面述及的历代教育思想都是与当朝统治者的意志相统一的。而在教育思想不断变化的同时,办学形式也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私学的蓬勃发展。

夏商周三代,与“土地国有”相联系的是“学在官府”。而从春秋时期开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士”阶层开始出现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由于春秋末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各诸侯国的史官多流落各地,还有一些文化官吏和百工携带原藏于宫廷的典籍和礼乐器物四处逃亡,从而出现了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论语》中载“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

^① 王连曾:《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略(上)》,载《齐齐哈尔师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5期。

阳、击磬襄入于海”，^①讲述的就是当时乐师流亡四方，礼崩乐坏的情况。“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②在这种情况下，私学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了。“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③春秋末期的社会大变革成为中国私学教育形式产生的契机，私学教育从此在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此后私学虽遭秦始皇禁止，到汉代又开始复苏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汉代私学具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点：有了较明显的程度划分，即面向儿童的蒙养阶段教育和面向青年、成年人的专经阶段的教育；有了比较固定的教学场所，当时称为“精庐”、“精舍”；教师既有居官教授的，又有隐居教授的和辞官后还家教授的，其中后两种形成了专职的私学教师队伍；在学生的招收上不以贫富、地域、年龄和辈份为限，故学生来源十分广泛，而且出现了“著录”学生（不必到教师门下受业，只在师长处登录名籍）；在教学方式上开始出现“高业弟子次相传授”（即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的现象；在教学内容上，除儒学外，私学还承担许多非儒学说的文化知识的传授，如黄老之学、法律、天文、历法、医学。^④

很明显，汉代的私学不仅在数量上较官学为多，而且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各方面都已全面超过官学，从而在汉代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格局——私学为主，官学为辅，私学既是官学的基础，又是官学的补充。私学承担了文化发展和学术传播的主要任务，官学则旨在培养和选拔官吏，因而私学成了主要的教育承担者。在此后的中外教育交流中，私学也起着官学所无

① 《论语·微子》。

② 《左传·昭公十七年》。

③ 章太炎：《国故论衡》。

④ 参见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7页。

法取代的巨大作用。

2. 中朝教育交流

中国与朝鲜壤土相接，唇齿相依，很早就有了友好往来。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周武王灭商以后，封箕子于朝鲜，箕子制定“八条”原则统治人民，又教当地居民以田蚕礼仪，在朝鲜半岛传播中华文明。因此，中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足可追溯到商周时代。到战国秦汉时期，燕、齐、赵等地人民为避战乱而有许多到了朝鲜，带去了中国的文字、器皿和钱币。

公元前2世纪初，燕人卫满率1千余人迁居朝鲜，并于公元前194年建立了政权。《汉书》中记载了朝鲜建国的情况：“朝鲜王满，燕人。自始燕时，尝略属真蕃、朝鲜，为置吏筑障。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浞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度浞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蕃、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都王险。”^①但卫满政权存在时间不长，王位传至其孙卫右渠后，右渠因阻碍邻近部族与汉朝通商，与汉发生战争。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武帝灭卫满朝鲜，“遂定朝鲜为真蕃、临屯、乐浪、玄菟四郡”，^②统治中心在乐浪的平壤，史称“汉四郡”。此后直至西晋末年，中国在朝鲜设郡置县达400多年。这期间朝鲜既然作为大一统的汉帝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它的各项统治政策也就不能不与汉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正如宋人徐兢所言：“朝鲜自汉武帝列置四郡，臣妾内属而中华政化所尝渐被，虽更魏历晋，视时活隆，乍离乍合，然义理之根诸中者，未尝泯也。”^③

汉朝与朝鲜的这种关系反映到教育领域也同样是如此。前面已经讲到，汉代起主导作用的教育形式是私学，私学已成为官学

^{①②} 《汉书·朝鲜传》。

^③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儒学条》，引自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第271页。